

中国立场与理论自觉：刘建军“外国文学中国化”思想体系研究

China's Perspective and Theoretical Self-Consciousness: A Study of Liu Jianjun's Intellectual Framework of the "Siniciza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陈彦旭（Chen Yanxu） 张馨心（Zhang Xinxin）

内容摘要：本文系统考察了刘建军关于外国文学中国化的理论建构及学术意义。刘建军的理论建构立足于三大支柱：其一，他通过辨析原初的外国文学与中国的外国文学，确立了一个真实存在于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动态演变的本土文化现象作为独立研究对象，从根本上确立了中国学者的研究主体性与合法性。其二，他开创性地将百年来的外国文学接受史与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现代化“三步走”宏大叙事动态关联，为学科史赋予了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维度与国家面向。其三，他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作为顶层指导思想，以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话语重新理解与阐释外国文学，使之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文化建设。刘建军的学术贡献对于理解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理论自觉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也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提供了学科范例。

关键词：外国文学中国化；“三步走”现代化历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作者简介：陈彦旭，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张馨心，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本文为202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中国神话在当代多模态英语文学中的翻译与传播研究”【项目批号：23YJA752002】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China's Perspective and Theoretical Self-Consciousness: A Study of Liu Jianjun's Intellectual Framework of the "Siniciza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Abstra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Liu Jianjun'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academic significance regarding the "siniciza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Liu Jianjun's theoretical framework is built on three pillars: first, by distinguishing between "foreign literature in its original form" and "foreign literature in China," he identifies a dynamically evolving local cultural phenomenon that truly exist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 as an independent research object, thereby fundamentally

establishing the subjectivity and legitimacy of Chinese scholars in their research. Second, he pioneered the dynamic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entury-long history of foreign literature reception and China's grand narrative of the "three-step" modernization drive—from "standing up" and "growing rich" to "becoming strong"—endowing the disciplinary history with a profound historical materialist dimension and a national orientation. Third, he takes the theory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s the top-level guiding ideology, reinterpreting and expounding foreign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t stance and discourse to better serve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Liu Jianjun's academic contributions offer important insights into understanding the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research and provide a significant disciplinary example for constructing a discourse system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siniciza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the "three-step" modernization drive; Marxism; literary criticism

Authors: **Chen Yanxu**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00, China), specializing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chenyx525@nenu.edu.cn). **Zhang Xinxin** is Lecturer and a Ph.D.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00, China), specializing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zhangxx582@nenu.edu.cn).

在全球化语境下，如何处理本土与外来、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已成为各国文化发展面临的共同课题。对于中国而言，这一问题尤为突出。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学术界始终在探索一条既能吸收世界文明成果，又能保持文化主体性的现代化道路。在文学领域，这种探索集中体现为如何认识和处理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存在着一种结构性矛盾：一方面，我们需要通过研究外国文学来了解世界、借鉴经验；另一方面，我们又常常陷入“他者”视角的困境，难以确立自身的学术主体性。这种矛盾在学科建设中表现为理论话语的依附性、研究方法的模仿性以及价值判断的不确定性。如何摆脱这一桎梏，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研究体系，成为学界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

刘建军的“外国文学中国化”理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重要学术成果。他通过数十年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积累，系统阐述了外国文学在中国语境中的存在形态、传播规律和文化功能，为解决上述理论困境提供了富有创见的思路。他的研究超越了对单一作家或作品的零散评介，以一种高度的理论自觉和清晰的方法论意识，为整个学科的“中国化”发展提供一个

系统、严谨且具有操作性的宏大理论框架。刘建军的贡献不仅在于提出了若干创新性的学术观点，更在于他将这些观点熔铸为一个逻辑自洽、内在融贯的思想体系，深刻地回应了中国外国文学研究长期面临的身份认同、理论依附与话语失语等根本性问题。本文旨在全面梳理和深入分析刘建军的理论体系，揭示其内在的学理逻辑和方法论意义。通过这一研究，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和现实困境，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中获得关于如何建构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的启示。在当前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时代背景下，这一研究具有特殊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的外国文学”：一个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

在任何学科寻求理论自主的道路上，首要任务是明确界定其研究对象。刘建军的理论建构的基础，便是对“外国文学”这一看似不言自明的概念进行了深刻辨析，从而确立了“中国的外国文学”这一全新的、独立的研究对象。它构成了其整个思想体系的逻辑起点。

尽管学界一直关注如何处理外来文学与本土文化的关系，但对“外国文学中国化”这一概念的明确界定和系统研究却相对滞后。第一，以往更多从引进或接受的角度研究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影响，缺乏对“中国化”内涵的深入阐发。早在1988年，我国九叶诗人、外国文学研究专家、翻译家学者袁可嘉在《论新诗现代化》中曾提出，新诗一开始就接受西洋诗的影响，使它现代化的要求更与我们研习现代西洋诗及现代西洋文学批评有密切关系。¹这一观点在当今亦颇有启发性，但遗憾的是，该书对何为“现代化”或“中国化”的根本问题语焉不详。第二，关于外来文学进入中国后的演变规律与模式，既有研究多为定性描述，缺少整体历史视角下的动态考察。第三，改革开放以来，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指导思想下，外国文学研究者逐步意识到需建立中国人自己的话语体系。然而这一“本土化”诉求更多体现在方法论呼吁上，而对具体学科体系和话语模式如何构建的探讨尚不充分。

刘建军强调，在中国语境中研究外国文学，必须加上“中国的”限定。他提出，在中国根本不存在纯粹的外国文学，只有“中国的”外国文学。从这个角度反观中国近现代的翻译活动，刘建军认为这些活动的本质就是在“不同文化碰撞交流中奠基性地再造了一个(……)新的‘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本体论’与‘中国的外国文学’知识再造”4)。在此基础上，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原初的外国文学”和“中国的外国文学”两种形态的区分——所谓“原初性质”的外国文学，是国外某一个国家的作者，运用自己本民族的语言，在自己独特的社会文化语境中，针对自己生存社会中出现的问题所进行的文学实践的产物。而当外国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进入到中国的现实中和文化语

¹ 参见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21页。

境中时，经过翻译、阅读理解以及讲授传播过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化了，成了蕴含中国思维方式、具有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特色的第二文本，成为了中国文学的文化因子和文学现象。¹

这一观点颠覆了长期主导世界文学研究的普遍主义幻象——那种认为存在某种超越文化差异的“纯粹”文学的观念，或称其为“天真的普遍主义”(Naïve Universalism)。它将外国文学作品视为一个稳定、封闭、具有普适意义的客体，认为只要通过语言翻译，其原初的、纯粹的本质就能被任何文化语境中的读者所接收²，最早可以追溯到歌德有关世界文学的构想，他相信文学具有普遍性，能够跨越国界和文化障碍被理解和欣赏³。西方理论往往假定存在某种超越文化差异的普遍解释框架，而刘建军则强调，有意义的文学理解必须承认文化差异，并在差异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融合。这不是文化相对主义，而是一种辩证的文化观——既承认文化的特殊性，又在特殊性基础上寻求对话和理解的可能。刘建军的论断让我们警醒：当我们谈论莎士比亚、歌德或托尔斯泰时，我们实际上谈论的始终是“中国的莎士比亚”“中国的歌德”“中国的托尔斯泰”。

刘建军对这两者的区分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学者研究外国文学的身份焦虑和合法性危机。如果研究的对象永远是那个原初的、属于“外国”的文学，那么中国学者似乎永远只能扮演追随者、模仿者和二手贩运者的角色，其研究成果的原创性与主体性将始终受到质疑。然而，一旦将研究对象确立为“中国的外国文学”——一个在中国土地上真实发生、动态演变、并已深度融入中国现当代文化进程的本土文化现象——那么，运用中国的历史视野、中国的理论工具、中国的文化资源来对其进行分析和阐释，就不仅是可行的，更是唯一科学且合乎逻辑的方法。这一概念的确立，为后续所有关于“中国意识”和“中国化”的理论建构，提供了坚实的学理前提与合法性根基。他将“中国意识”确立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与核心方法。他明确定义道：“所谓‘中国意识’，就是从中国的现实需要出发来提出问题和选择研究对象，着眼于获得有助于中国文学建设的经验教训，还可以洞悉国外学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偏见，提出中国的独到见解和看法”（“‘中国意识’是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前提和关键所在”19）。这一定义清晰地表明，“中国意识”并非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一种主体性的研究姿态，要求学术研究必须具备明确的问题导向与现实关怀，即服务于“中国问题”。

此外，刘建军的这一观点，还将读者的注意力从文本的原初本体转移到

1 参见 刘建军：“论‘中国的外国文学’的基本特征”，《外语与外语教学》4（2023）：107。

2 参见 Charles R. Larson, “Heroic Ethnocentrism,” *The Idea of University in Literature* 3 (2016): 463-475.

3 参见 Marcos Natali, “Beyond the Right to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46 (2009): 177.

了文本的接受与再造上。这与 20 世纪后期西方比较文学界最前沿的理论思潮，尤其是以姚斯（Hans Robert Jauss）和伊瑟尔（Wolfgang Iser）为代表的接受美学相互应和。接受美学强调，文学作品的意义并非仅仅蕴藏在文本之内，而是在读者具体的“期待视野”中被历史性地生成。刘建军的理论，可以说是在中国语境下对接受理论的一次强有力的、本土化的创造性实践。他所说的“中国的外国文学”即“第二文本”，正是一个在蕴含了中国历史、哲学与审美经验的独特“期待视野”中，被重新激活和赋予意义的生命体。

因此，刘建军的理论极大地提升了“翻译”与“接受”的地位。在外国文学领域，翻译不再是机械的搬运工作，而参与到外国文学的中国化进程中，即“外国文学观念、作家作品和大量文学现象译介到中国，被中国人所知晓、所理解和所扬弃，并成为中国的外国文学知识形态的历史文化进程”（刘建军，“‘翻译本体论’与‘中国的外国文学’知识再造”5）另一方面，中国读者与学者也不再是异质文化的被动消费者，而是新意义、新文本的积极创造者。这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确立了无可辩驳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将研究范式从“向外看”的单向引介，转变为“向内求”的、以我为主的知识建构。这种理论自觉，标志着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从一种后殖民式的抵抗话语，转向了一种后革命时代的建设性话语。后殖民理论往往聚焦于反抗、模仿、解构等与前宗主国的权力关系，其理论前提是一种历史性的不平等。刘建军的思想，虽然承认历史中存在的不平等，但其立足点是一个拥有政治主权与文化自信的现代中国。其核心议题不再是如何反抗既定的霸权，而是如何建设一个服务于民族复兴的强大现代文化。因此，对外国文学的借鉴，不是对帝国的“反写”，而是“为我所用”的战略性建设。这是一种属于崛起中大国的文化理论，其姿态是积极的、建构性的，而非防御性的。

二、从“站起来”到“强起来”——一个与时俱进的历史政治视角

针对外国文学何以大规模进入中国、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刘建军提出了一个开创性见解：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同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三步走”现代化历程动态相关。这一观点强调，外国文学的引进和中国化并非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随着中国社会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阶段而演进。在他看来，每个阶段中国所引进和重视的外国文学，都是为了满足该阶段的思想文化需求，体现出服务国家发展实践的特点。¹这种阶段性的关联既是历史事实的总结，也是对外国文学中国化特殊性的理论概括。

由此可见，刘建军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即文学作为上层建筑，其发展必然与特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和历史任务紧密相连——创造性地运用于外国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史研究，从而为外国文学研究赋予了深刻的历史

¹ 参见刘建军：《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研究·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5页。

维度和国家面向。这种分期不仅是对学科史的梳理，更是一种强有力的话语建构行为。它通过将外国文学研究嵌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叙事框架，极大地提升了该学科的地位和意义，宣告了外国文学研究并非远离现实的屠龙之技，而是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休戚相关的核心人文学科之一。

具体而言，第一阶段是1919-1949年间，中国翻译引进的外国文学主要服务于新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需要，体现反压迫、反剥削和革命斗争主题，这是历史赋予文学的使命。具体表现为：以苏联作品为代表的外国文学强调阶级斗争和人民反抗，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更明确走向“为工农兵服务”方向，这种文学倾向符合当时推翻三座大山、抗击日本侵略的历史任务。

刘建军对1919-1949年间中国外国文学接受史的分析，展现了一种成熟的历史辩证法视野，这种视野在当今比较文学研究中显得尤为珍贵。他不回避这一时期文学选择的政治性，反而正面阐述了这种政治性的历史合理性。从世界文学史的宏观视角来看，任何一个民族在其关键的历史转折期，文学都不可避免地承担起超越纯审美的社会功能，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文学如此，俄国十月革命前后的文学如此，拉丁美洲的解放文学亦如此。刘建军特别强调了苏俄文学在这一时期的特殊影响力——当时的中国文艺界掀起了苏联“红色文学”出版的热潮，法捷耶夫（Alexander Fadeyev）、费定（Konstantin Fedin）、阿·托尔斯泰（Aleksey Nikolayevich Tolstoy）等一大批“红色作家”的代表作被译介和评价。¹这一现象表明，这些作品的感召力超越了意识形态的界限，触及了那个时代中国人共同的情感结构，即对社会正义的渴望，对民族解放的期盼，对新世界的想象。这种跨越政治分野的文学共鸣，恰恰证明了这些作品选择的历史必然性。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所推崇的“为艺术而艺术”，实际上也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它产生于欧洲资产阶级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是19世纪中后期欧洲艺术家面对资本主义社会艺术商品化威胁时，为捍卫艺术独立性和纯粹性而采取的一种精神抵抗策略。²而在中国1919-1949年的历史语境中，倘若坚持纯审美的文学立场，实际上意味着对民族苦难的漠视，对历史责任的逃避。因此，文学的社会功能与审美价值并非截然对立，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承担社会责任本身就是一种美学选择，甚至是最高的美学境界。中国不是世界文学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和创造者。即使在最困难的历史时期，中国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参与着世界文学的建设，并为世界文学贡献了独特的经验和视角。

第二个阶段则是在1949-1979年间，中国外国文学引进紧密围绕“革命”

1 参见刘建军：《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研究·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27页。

2 参见宋世明：“为艺术而艺术：一场审美现代性的扩容运动”，《求是学刊》3（2006）：123。

与“建设”这双重主题展开。以苏联文学为代表，既译介了表现革命斗争的作品（如《母亲》《青年近卫军》等），也引进了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如《被开垦的处女地》《水泥》等）。接下来，刘建军还将这一具体案例的分析扩展到对整个时期外国文学引进规律的思考。不仅是苏联文学，包括英法美德等西方国家文学，以及后来的拉美、非洲、亚洲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都被纳入“革命和建设双重任务”这一总体框架中加以考察，体现了作者对这一时期中国外国文学传播史的整体精准把握。总之，共和国建立后的前三十年，引进外国文学始终以革命和建设的双重任务为基本原则。外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评价，被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无论是高尔基（Maxim Gorky）、奥斯特洛夫斯基（Nikolai Ostrovsky），还是雨果（Victor Hugo）、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只要其作品有利于鼓舞群众斗志或塑造新人品格，便被赋予了文学经典的地位。

在这个阶段，刘建军将这三十年的文学实践界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延续时期，同时也是1978年改革开放的前导时期¹，具有革命与建设的双重主题。这种叙述不仅契合当时文化政策的历史语境，也为后续具体案例分析提供了坚实的结构支点，具有鲜明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特征。换言之，哪种外国文学能够帮助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激发革命斗志或提供建设经验，就最有可能在这一时期被选择、翻译并推广。这种文学引进策略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视角来看，是特定历史语境中“世界文学”流动的选择性适应。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面对近年来国内学界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艺术价值低”“意识形态化”的批评，刘建军通过重返历史语境，论证其“历史情境的正当化”，深刻指出：“这部小说完美地体现了中国社会20世纪50、60年代‘知识型构’的要求”（“论‘中国的外国文学’的基本特征”109）。刘建军所提出的“知识型构”，与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的“épistémè”（知识型）概念非常相近。后者是知识考古学研究的核心。“知识型”并非指某个时代知识的总和，而是指在特定历史时期内，为知识和话语划定可能性条件的潜在框架或结构。福柯将其描述为“知识的积极无意识”（10），是一套先验的规则体系，它支配着在一个时代中什么可以被思考、被言说，以及什么被认为是真理。²这种理论框架提供了一个深刻的视角：可以将“知识型”理解为一个时代不为人所见的“操作系统”。这个操作系统决定了哪些“程序”（思想、话语）可以运行，文件如何被组织（知识分类），以及哪些操作是可能的。“知识型构”并非静止的，而是具有积极的防御性和前瞻性。它旨在规训思想和行为的边界，以防止意识形态的偏离。生活在特

1 参见刘建军：《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研究·第四卷（1949-197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页。

2 参见L.A. Korkishk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Knowledge in Michel Foucault's Philosophy of Culture: From Epistemes to Discipline,” *Pushkin Leningrad State University Journal* 1 (2025): 149.

定知识型中的人们，也在使用其内在逻辑进行思考和言说。

总之，革命与建设双重主题下的外国文学引进，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一环，以革命和建设为中心环节来筛选世界文学。这种做法虽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但在彼时彼地却是合理且必要的：它帮助一个百废待兴的新兴国家汲取精神养料、塑造文化认同，并为国内文学创作提供了现成的范例和标杆。即便若干作品在纯文学价值上未必臻于完美，但它们所承载的时代精神价值不可低估。并且，这种文学范式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不仅影响了创作方法，更重要的是确立了文学与现实、文学与人民的新型关系，进而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学范式。这种范式不同于欧洲比较文学传统中的影响研究或平行研究，它更关注文学如何在不同的革命语境中发挥相似的社会功能。中国读者看到的不仅是苏联的革命故事，更是自己正在经历的革命现实的文学镜像。这种阅读创造了一种特殊的“革命共同体”意识，超越了民族和语言的界限。

由此可见，外国文学学科的价值与发展空间，始终与其对国家整体战略的贡献度紧密相连。学科的“自由度”并非通过与国家权力的对抗获得，而是在与国家目标的协商与契合中实现的。这是一种与西方理论中“文学场”自主性截然不同的历史逻辑与现实图景。¹

刘建军提出的最后一个阶段以改革开放为起点，以欧美文学为代表的现代派文学被大量引入。原因在于，新时期的中国正在努力实现现代化，这意味着文化上的转型。²回顾那一段的历史，在现代化建设初期，中国知识界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将出现怎样的新情况、新问题。当时国内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著名的“人性论”与“人道主义”大讨论。这一思潮的兴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的酝酿和人的主体意识觉醒密切相关。人们认识到，没有对个性和人性的尊重与解放，就不可能建立起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正如朱光潜等学者主张的那样，文学需要关注“共同的人性”以对抗过往极端的阶级斗争观念³。与此同时，另一批学者从现代主义的角度进行理论探讨，研究如何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经验来丰富中国文学。这期间，大量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经典被介绍进来，包括卡夫卡（Franz Kafka）、乔伊斯（James Joyce）、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以及存在主义和荒诞派作家的作品等。这些作品描绘了工业化、都市化社会中人的异化与精神困境，为中国读者提供了全新的审美体验和思想借鉴。随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也开始传入中国。步入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市场经济

1 参见 Gisèle Sapiro, “The Structure of the French Literary Field During the German Occupation (1940-1944),” *Poetics* 30 (2022): 387-402.

2 参见 刘建军：《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研究·第五卷（1979-201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页。

3 参见 朱立元：“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文学是人学’命题的再阐释——兼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学基础”，《探索与争鸣》9（2008）：9。

济的全面铺开和物质文明的极大丰富，中国社会的核心议题再次转变。曾经被压抑的人被成功解放后，一个新的问题浮现：在消费主义的浪潮中，人的主体地位是否面临着以一种新形式被消解的危险？这一新的焦虑，为西方后现代文学的大量引介打开了通道。后现代主义文学所特有的消解深度、平面化、反讽以及对一切宏大叙事的怀疑，恰好与当时中国社会出现的消费文化、价值多元乃至意义虚无的症候相契合。以王朔为代表的“痞子文学”正是这种后现代姿态的本土化身，他用戏谑、调侃的语言解构了传统文学所承载的崇高与严肃，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回响。与此同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等作家的流行，则标志着中国读者开始欣赏一种更具智性、充满思辨和语言游戏的文学。昆德拉对历史、政治与个人存在之间荒谬关系的智性反讽，尤其迎合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在告别旧有理想主义后，试图以一种更复杂、更清醒的姿态审视世界的心理需求。

进入 2012 年以来的新时代，我们见证了又一次深刻的转向，其核心标志是中国文化自信的崛起以及建立自身话语权的强烈诉求。外国文学的引介不再是亦步亦趋地追随西方热点，而是变得更具问题导向和主体意识，主动选择与中国当下核心议程相关的议题，并体现出更加鲜明的跨学科意识。刘建军提出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包括：社会学批评的深入发展对欧美文学研究产生了怎样的促进作用？比较文学学科对外国文学中国化具有什么作用与价值？如何看待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出现对中国话语的建构作用？新时期以来学术团体日益发展壮大，在外国文学中国化进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重要的作用？¹ 这些问题的提出与解决，标志着中国学界正努力从一个长期以来的理论输入者和应用者，转变为一个理论建构者。这种从“跟着跑”到“并跑”到寻求“领跑”的雄心，旨在构建能够与世界平等对话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并相信中国的独特经验能够为世界文学理论的创新提供新的可能性。这不仅是学术策略的调整，更是国家文化主体性在全球知识格局中重塑自身的深刻体现。

三、马克思主义统摄与学科自主的辩证统一：外国文学中国化理论的哲学基础

刘建军上述创新观点的提出，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学理逻辑。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与社会、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原理，结合其在中国的实践，共同为刘建军的理论提供了坚实支撑。他把外国文学中国化看作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没有新中国的政治、文化土壤，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不可能大规模引进并改造欧美文学。正因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学者才能在翻译、研究外国文学时坚持了明确的方向。刘建军指出：“中国的欧美文学，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结合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和

¹ 参见 刘建军：《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研究·第五卷（1979-201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 1-2 页。

化进程需要的新文学样式”（“关于‘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的若干问题”88）。这个论断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文化的发展是一个主动选择、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外来文学进入新的社会环境，必然被赋予新的功能和意义，从而服务于新的社会实践。

以上论断是刘建军又一理论贡献，即将外国文学中国化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领域的一种具体化路径。他富有创见地将“中国化”划分为一个层级分明的系统，并指出，“中国化”也是一个层级体系，包括指导思想的中国化和具体领域的中国化，不同层级的‘中国化’分别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关于‘中国化’概念及相关问题的思考”10）。在这个体系中，居于顶层的是“指导思想的中国化”，其核心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它为下层所有“具体领域的中国化”提供着根本的理论指导与方向引领。

刘建军指出，一切具体领域和学科的“中国化”，都是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总统筹和总指导下进行的（“关于‘中国化’概念及相关问题的思考”10）。这一论断的深刻性在于，它既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统摄地位，又承认了具体学科领域的相对独立性。

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的“总统筹和总指导”地位并非简单的行政命令或意识形态要求，而是基于其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和真理性。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总统筹”，根本在于它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外在于各学科的抽象原则，而是内在于人类认识活动的基本规律。当我们研究外国文学时，无论是分析作品的社会历史背景，还是探讨作家的创作心理，抑或是考察文学流派的演变规律，都离不开对物质与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基本范畴的理解和运用。他多次强调，新中国以来外国文学的引进与研究，是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他明确指出：“外国文学在进入到中国后（……）中国开始了自觉用马克思主义（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我们文学实践，从而形成了中国人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阐释外国文学发展的崭新模式，从而形成了中国的外国文学最鲜明的特性”（“论‘中国的外国文学’的基本特征”113）。

然而，这种统摄性并不意味着对具体学科的简单支配。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有其独特的存在方式和发展规律，不能简单用经济决定论或阶级分析法来解释所有文学现象。其次，文学研究需要文本分析、审美判断、心理阐释等专门方法，这些方法虽然可以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指导下运用，但不能被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所替代。最后，文学作品的价值不能仅从政治立场或阶级属性来判定，还需要考虑其艺术成就、审美价值和人文内涵。

与此同时，刘建军还提出了两种学界存在的错误倾向。一是将马克思主义指导简化为“总体化代替具体领域的中国化”（“关于‘中国化’概念及相关问题的思考”10），其理论症结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这种

倾向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具体论断当作永恒真理，把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判断当作普遍规律，把复杂的理论体系简化为几条抽象原则。在外国文学研究中，这种倾向表现为：用阶级斗争的单一视角解读所有作品，用“进步”与“反动”的二元对立评判所有作家，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标准衡量所有流派。这种机械化的做法不仅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精神，也阻碍了外国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¹

更深层的问题是，这种机械化倾向源于对“指导”一词的误解。真正的理论指导不是给出现成的答案，而是提供分析问题的方法；不是规定研究的结论，而是指明思考的方向。恩格斯晚年反复强调，他和马克思的理论是研究的指南，而不是教条。这种指导是启发性的而非规定性的，是方法论的而非结论性的。

第二种错误倾向是从事那种“没有指导思想的各个学科领域为所欲为的‘中国化’”（“关于‘中国化’概念及相关问题的思考”10），可理解为以学科独立性为借口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种倾向的理论症结在于把学科的特殊性夸大为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对立。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文学是纯粹的审美活动，与意识形态无关；文学研究是纯粹的学术活动，与价值立场无关，实际上是在宣扬一种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的文学观。

这种倾向的危害在于，它不仅割裂了文学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也否定了文学研究的现实意义。文学从来不是脱离社会的纯粹审美活动，文学研究也从来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事业。正如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所言，所有的文学批评都是政治批评。² 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表面上是追求学术独立，实际上往往是在不自觉地接受其他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当今西方理论话语强势的背景下，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往往意味着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陷阱。

刘建军所提出的辩证关系，其理论创新在于超越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确立了亦此亦彼的辩证统一范式。这种范式承认矛盾的客观存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与学科的特殊性之间确实存在张力，但这种张力不是不可调和的对抗，而是推动发展的动力。正是在这种张力中，产生了理论创新的可能性。

从认识论角度看，这种辩证统一体现了具体的普遍性原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而是通过具体学科的特殊形式表现出来的。外国文学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加外国文学，而是马克思主义

1 参见 刘建军：“关于‘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的若干问题”，《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2012）：86-90。

2 参见 陶东风：《文学理论的公共性：重建政治批评》，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5页。

在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具体化、特殊化。从方法论角度看，这种辩证统一要求我们掌握“度”的艺术。既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泛化为包办一切，也不能把学科的独立性绝对化为拒绝指导。这个度的把握，需要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实践智慧。在具体研究中，要善于在坚持基本原理的前提下灵活运用，在尊重学科规律的基础上创新发展。这种平衡关系的把握，避免了教条主义和虚无主义两个极端，为外国文学研究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理论保障。

在此框架下，“外国文学的中国化”便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学科内部议题，而是被清晰地定位为整个国家思想文化战略布局中的一个具体领域转化路径。这意味着，外国文学研究的选题、方法、价值判断乃至最终目标，都必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相对接，成为这一宏大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换言之，外国文学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场域之一。

他强调，在中国化进程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与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任务相结合（“关于‘中国化’概念及相关问题的思考”¹）；同时又要立足强大的中华文化传统，强调外来文学只能在改造和丰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才能真正“中国化”，而绝非割裂或取代传统。这意味着，外国文学进入中国的过程不仅仅是文艺现象，更承载着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的选择与整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领域的具体落实方式。

刘建军以新中国成立以来三次具有代表性的外国文学教材编写实践，以说明马克思主义指导如何赋予外国文学研究以“中国立场”。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杨周翰、朱光潜等前辈编写的第一代外国文学史和文论教材，他们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评述外国文学；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初期朱维之、赵澧等编写的《外国文学简编》等教材。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新的理解，更注重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刘建军指出，现在中国社会发展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因而需要用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新一代教材则应以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话语，对世界文学经典进行新的梳理评判，使之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文化建设。这一观点背后的理论支撑，则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两个结合”¹，其中第二个结合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种“现代化”也一定包含着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形成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和文化特质。²

那么，就“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这一话题而言，刘建军很早就提出了一个论断：我国的外国文学工作者一开始所意识到的现代性就是在批判继承文化传统上的现代性，中国的欧美文学研究是在批判、鉴别之中进行着创新，是在自己传统文学的基础上进行的再造，整个过程自始至终贯穿着现代性的反

1 指与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2 参见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21页。

思与自我反思、批判与自我批判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反过来又塑造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品质。西方文学观念进入中国并非与中国传统文学观念无涉，而是找到了内在的契合点：中国的“诗歌言志”与西方的“文学反映生活”、中国的象征手法与西方的象征主义、中国的写实传统与西方的现实主义，都存在着天然的亲和性。¹由此，我们可以推出结论：外国文学的中国化并非外来文化的强制植入，而是中国文学自然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必然结果。正是通过与外国文学的创造性结合，中国传统文学获得了现代性的关键因子，实现了从古典向现代的历史性转型。这种转型不是断裂式的，而是在继承中发展、在借鉴中创新，最终形成了既有世界性又有民族性、既有现代性又有传统底蕴的中国现代文学。

这种现代性不是西方文化的专利，而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共同特征。以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为基础的现代主体意识，强调个体价值、内心世界和情感解放；以进化论为底色的线性、进步的历史观念，取代了传统的循环史观；以现实主义为代表的全新叙事方法，追求对社会现实进行客观、全面的描摹与深刻的批判性反思；以及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紧密相关的国族认同与集体想象——这些现代性要素通过外国文学的引介，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民本思想、天下情怀等优秀元素相结合，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郭沫若的《女神》将西方浪漫主义的激情与中国传统的宇宙意识相融合，创造出充满生命力的新诗歌；茅盾的《子夜》运用西方现实主义的全景式描写方法，展现了中国社会的复杂图景；巴金的《家》《春》《秋》借鉴俄国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对中国封建家庭进行了深刻批判。当代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进一步证明了这种结合模式的成功。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将拉美文学的想象力与中国乡土叙事传统相结合；余华的先锋小说借鉴西方现代派技巧表现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刘慈欣的科幻作品将西方科幻文学的想象模式与中国文化的宇宙观完美融合。这些成就表明，外国文学已经完全内化为中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推动中国文学不断创新的动力。通过对语言文体、思想观念和主体美学三个层面的现代化重塑，借助“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的原则，最终催生了形态与精神焕然一新的中国现代文学。新时代的外国文学研究者的核心任务，是在全球文明互鉴的广阔视野中，深入发掘外国文学中那些能够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思想资源的宝贵遗产。我们的研究，应当致力于“讲好中国故事”，通过与世界文学的比较与对话，更深刻地阐释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与文化内涵。

综上所述，刘建军在“外国文学中国化”研究中的贡献是全方位的，且影响深远。他提出的诸如“在中国只有‘中国的外国文学’”、坚持中国立

1 参见 Marcos Natali, “Beyond the Right to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46 (2009): 177.

场“为我所用”、强调外国文学经典化的本土意义、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等创新观点，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这些观点背后蕴含的学理逻辑严谨，既有马克思主义文论和中国化理论的宏大视野支撑，又有接受美学、比较文学等方法论的细节阐释作为依托，更结合了百年来中外文学交流的丰富史实作为论据。这些研究直面当下外国文学学界所面临的问题：例如，我们为何而研究外国文学、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持学科主体性、如何使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交融发展等等。刘建军的理论体系诞生于中国全面建构人文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伟大时代。它为外国文学这一高度“涉外”的学科，乃至更广泛的外来文化研究领域，清晰地擘画出一条从“引进来”（学习借鉴）到“中国化”（融合再造），再到“走出去”（带着中国话语参与世界文明对话）的完整路径。在当前国际格局深刻演变，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强调文化自信、倡导文明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下，刘建军的理论体系更彰显出其深刻的文化战略意义。

Works Cited

- Árnason, Garðar. *Foucault and the Human Subject of Science*.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8.
- Korkishko, L. A.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Knowledge in Michel Foucault’s Philosophy of Culture: From Epistemes to Discipline.” *Pushkin Leningrad State University Journal* 1 (2025): 149-160.
- Larson, Charles R. “Heroic Ethnocentrism.” *The Idea of University in Literature* 3 (2016): 463-475.
- 刘建军：“‘中国意识’是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前提和关键所在——以《拜占庭：东罗马帝国文学史》的写作为例”，《外国文学研究》5（2024）：19-23。
- [Liu Jianjun. “‘Chinese Consciousness’ Is the Premise and Key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A Case Study of the Writing of Byzantium: 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Eastern Roman Empir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5 (2024): 19-23.]
- ：“论‘中国的外国文学’的基本特征”，《外语与外语教学》4（2023）：107-115。
- [—. “On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Foreign Literature in China’.”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4 (2023): 107-115.]
- ：“关于‘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的若干问题”，《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2012）：86-90。
- [—. “Reflections on Several Important Issues Concerning the ‘Sinicization Process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Journal of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3 (2012): 86-90.]
- ：“关于新时代世界文学教材建设的发言”，《新时代世界文学教材建设座谈会会议纪要》，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23年。

- [—. “Remark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 Literature Textbooks in the New Era.” *Minutes of the Symposium on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 Literature Textbooks in the New Er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2023.]
- : 《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研究》（六卷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
- [—. *A Study on the “Sinicization” Process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in the Past Century Volume I-VI*. Beijing: Peking UP, 2020.]
- : “关于‘中国化’概念及相关问题的思考——兼论外国文学乃至具体学科‘中国化’问题”，《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2018）：1-10。
- [—. “Thoughts on the Concept of ‘Sinicization’ and Related Issues: Also on the ‘Siniciza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and Even Specific Disciplines.” *Journal of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 (2018): 1-10.]
- : “‘翻译本体论’与‘中国的外国文学’知识再造”，《上海翻译》3（2022）：1-6。
- [—. “‘Translation Ontology’ and the Knowledge Reconstruc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in China’.” *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 3 (2022): 1-6.]
- 刘小新、杨建民、郑海婷：《美学探讨与话语建构》（上）。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20年。
- [Liu Xiaoxin, Yang Jianmin and Zheng Haiting. *Aesthetic Exploration and Discourse Construction* Vol. 1. Zhenjiang: Jiangsu UP, 2020.]
- Natali, Marcos. “Beyond the Right to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46 (2009): 177-192.
- Sapiro, Gisèle. “The Structure of the French Literary Field During the German Occupation (1940-1944).” *Poetics* 30 (2022): 387-402.
- 宋世明：“为艺术而艺术：一场审美现代性的扩容运动”，《求是学刊》3（2006）：120-124。
- [Song Shimeng. “‘Art for Art’s Sake’: An Expanding Movement of Aesthetic Modernity.” *Seeking Truth* 3 (2006): 120-124.]
- 陶东风：《文学理论的公共性：重建政治批评》。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
- [Tao Dongfeng. *The Publicity of Literary Theory: Reconstructing Political Criticism*. Fuzhou: Fujian Education Press, 2008.]
- 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
- [Yuan Kejia.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New Poetry*.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8.]
- 朱立元：“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文学是人学’命题的再阐释——兼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学基础”，《探索与争鸣》9（2008）：4-10+2。
- [Zhu Liyuan. “From the New Period to the New Century: Reinterpreting the Proposition that ‘Literature is the Study of Man’—Also on the Humanistic Foundation of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Exploration and Contention* 9 (2008): 4-10+2.]